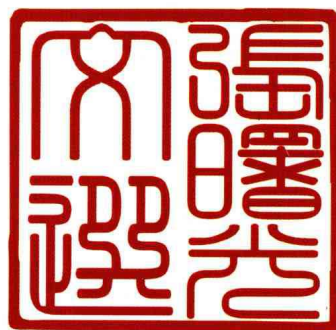


心交神往知与识

张曙光◎著

· 序文前言卷 ·

Prologues and Introductions: Association
and knowledge



Anthology of Zhang Shuguang
张曙光文选

张曙光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心交神往知与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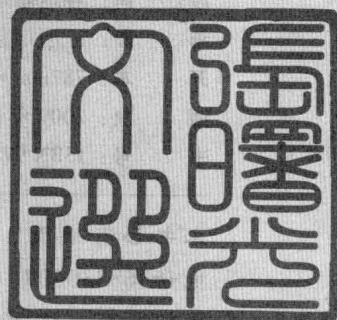
张曙光◎著

·序文前言卷·

Prologues and Introductions: Association
and knowledge



Anthology of Zhang Shuguang
张曙光文选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北京

张曙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心交神往知与识: 序文前言卷/张曙光著. -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6

(张曙光文选)

ISBN 978 - 7 - 5017 - 8615 - 2

I. 心… II. 张… III. 经济学 - 文集 IV. 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4911 号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100037 ·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网 址: www.economyph.com

组稿编辑: 乔卫兵 (电话: 010 - 64471876 weibingq@sina.com)

责任编辑: 崔姜薇 (电话: 010 - 68355210 - cuijiangwei@hotmail.com)

责任印制: 石星岳

封面设计: 华子图文设计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承 印: 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4.25 字数: 39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8615 - 2

定价: 50.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由我社发行部门负责调换,
电话: 68330607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68359418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68344225 68341878

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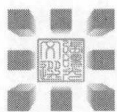
这篇自序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总序，简要地回顾我的人生历程和学术生涯，是各卷中相同的内容。第二部分是分卷，介绍各卷的内容，是各卷中不同的内容。

—

二〇〇九年农历九月初八是我七十岁诞辰，也是我从事经济学学习和研究五十周年。《张曙光文选》的编选和出版，一方面是对自己学术生涯的一个小结，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

我的家乡是陕西省长安县秦岭山脚下的偏远农村，距西安市 50 多里。我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两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寡母勤劳刚毅，耕织皆是一把好手，在传统社会，能够顶门立户，将我养大成人，教我读书成才，其所受的身体之痛和心灵之苦，是外人难以理解和体知的。先母 1983 年病故，生前母子分处西安和北京两地，我也很少尽人子之孝。对于母亲的养育之恩，我始终怀着深厚的崇敬和感激。

1959 年，我考入西北大学经济系统计学专业，开始了经济学的学习和训练。在校期间，对我影响大的老师有何练成、冯大麟、吕其鲁三位教授。我的第一节政治经济学课是何老师讲授的，后来还听过他的多次报告，他传达孙冶方先生价值论的报告我至今还历历在目。我一进校，就从“反右倾”运动的小字报中知道冯大麟和陈维满合作出版了《中国工农业协调发展问题》的著作，冯老师又给我们讲授《国民经济计划》课，因为培养了我这个“白专”典型，并支持和指导我报考研究生，文革中曾经受到冲击和批判；文革后曾任陕西财经学院院长，每次来京总要来家看我，并一起交谈。吕老师给我们教《国民经济统计》，当时因在《经济研究》上发表文章而受到师生的拥戴，也成为我学习的榜样。



大学时期正值三年困难时期，我也因营养不良而患了浮肿，腿上一按一个坑，半天起不来。不过我的学习没有放松。当时兴交际舞，很多同学星期六、星期天跳到午夜12点，我是个舞盲，也不感兴趣，这些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资本论》就是在这个时候读的。

1963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学校和老师鼓励我考研，帮我报名，给我时间复习准备。结果一举考中，一起录取的还有两位师兄弟杨圣明和李德华。专业是“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导师是杨坚白教授，副导师是董辅初、刘国光教授。谁知，专心致志学习了一年，接着就是不断的政治运动。1964年经济所批判孙冶方，我们几个来所不久的年轻人被分派去监护顾准；1965年参加周口店农村“四清”；1966年研究生学习期满毕业，接着就是十年“文革”的浩劫和干校的劳动改造。在极左社会思潮的裹胁下，文革初期当过造反派，做过蠢事，中后期挨过整，被打成反革命，隔离审查达四年之久。1968年冬，我婚后一个月离家回京，第二天即被关了起来。我因失去了一切自由，音信全无，妻子在担心、屈辱和泪水中度日；后来可以给家人写信，但必须经过审查；干校时因病住院手术（阑尾切除）也有人监视和看管；大女儿满月时，我被允许回家看过一次，直到两岁多我才第二次见到她，她自然不认识我这个父亲，一见面，竟跟着她的表姐叫我“舅舅”。切肤之痛，深知自由之可贵。这也许影响到我今天的价值立场和人生态度。

1977年开始恢复业务，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在鸟家培教授主持下，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学习《论十大关系》宣传材料”。实际做研究工作是1979年的事情。该年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略论自负盈亏”，真正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生涯。至今也已30个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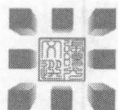
1980年，为了推进经济调整，中央政策研究室组织编写《学习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参加者有林子力、刘国光、曾启贤、胡瑞梁、田光、肖灼基和我。具体任务有二，一是为《资本论》第二卷的每一篇写一篇解读文章，刘国光和我负责第3篇；二是对《资本论》第二卷进行删节，删去2/3。一方面，该书作为干部学习材料广为发行，另一方面，在编撰者中除我以外，都是文革前出道的名家，再加上为了配合这次学习，《经济研究》从1980年第5期开始开辟了一个“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专栏，约我就“学习《资本论》第二卷”连续写了三篇文章。于是，很多

没有见过面的学人都把我当成了“老先生”。这就提高了我在国内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和影响。

我接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改革开放既是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批判，也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反思。随着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发展，我也经历了一个理论知识转型和研究范式转换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对传统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解释力发生了怀疑，这种怀疑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日益增长，于是开始学习现代经济学，更新知识结构。这是一个虽不能说是痛苦但也不那么轻松的过程。我原来学习的是俄语，英语是文革后听广播自学的，只能看，而且阅读的速度较慢。因此，我的学习方法有三，一是认真阅读当时翻译过来的著作，凡读过的著作，对其中的基本概念和方法一定要搞懂弄通；二是主动与青年学者一起讨论和交流，虚心向他们学习。其中，与樊纲、杨仲伟等一起研究和撰写《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起了重要的作用。有朋友感到不解，曾经问我，你已经是研究员了，为什么总和年轻人混到一起。三是读书和评书。应当充分肯定，我的知识很多是从书评中来的，这方面的文字也最多。在《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和《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中，我将对此做出交代。经过10年的努力，我基本掌握了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完成了知识转型和范式转换，以另一种面貌出现在学术界。这时，一些未曾谋面的学人读了我的文章，又把我当成一个青年学者。从这套文集中，读者可以看到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我之所以能够完成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也许与我对新事物的敏感和执著不无关系。就以换笔而论，20世纪90年代初计算机还是新鲜玩意，看到个别青年学者使用计算机写作，甚为羡慕，决心效法。1993年，有一个与美国学者萨克斯、胡永泰、史泰利等进行合作研究的项目，我与樊纲等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做访问学者，花2000多美元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回国后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学会了五笔字形输入法，开始照着文稿用计算机“写”第一篇文章“关于地区经济差异的另一种解释”。敲了一半，就干脆扔掉文稿，边思考边输入，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写作方式。

认识到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必要性的人，也许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认真实践，并实际完成和实现者很少。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有没



有信心和决心，因为这样做必定是有成本的，而传统理论仍然有其市场和需求；二是能不能下这样的工夫，四五十岁的人要做二三十岁人做的事情，有些甚至是从头做起，不下一番苦功是完成不了的，不少人也许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态度和方法，现代经济学的优势在年轻人和留学者方面，对年轻人和留学生的态度，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有人往往以己之长对所短，瞧不起年轻人；有人又感到年轻人咄咄逼人，对自己名利地位构成威胁。这就妨碍了自己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努力，堵塞了更新知识的路径。于是出现了这样的结果，或者抱残守缺，在传统理论的框框内打转转，甚至借学术批评之名做一些政治批判和道德批判的事情，或者告老退休，离开学界。

说心里话，我进行知识更新和范式转换，并没有要在理论上做出多大贡献的雄心，只是想延长自己的学术生命而已。应当说，这个目的达到了。古语云，人生七十古来稀。在目前的国内，一个七旬之人，仍然活跃于学术界，还能在《经济研究》、《经济学（季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理论文章，如果不是独一无二，也属凤毛麟角，恐怕也找不出几个人。如果说，在年轻的时候还有对名利的憧憬和追求，那么，到了后来，读书、思考、写作就成了生命活动的一部分。浸沉在这样的氛围中，整天忙忙碌碌，干自己所想和所好的事情，我的确感受到莫大的幸福和快乐。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我的学术创作活动主要是围绕着本单位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曾先后参与了“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产业结构对策”、“2000 年的中国”、“深圳发展战略”和“海南发展战略”、“‘六五’经验总结”、“‘七五’国力预测”、“‘八五’改革大思路”，以及“体制变革中的宏观经济稳定”等项研究。这既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在理论界处于主导、甚至垄断的地位，在改革开放中的确起了打破理论禁区，推动解放思想的作用，政府也有很多重要课题都交给他们；另一方面，自己也比较年轻，既有精力和热情，也需要学习和锻炼。90 年代以来，自己开始独当一面，亲自主持了一些重大课题的研究。诸如“中国贸易保护代价的测算”、“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目标管理：宏观经济学”、“市场化进程中的宏观稳定”、“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核算”、“城市化背景下土地产权的实施和保护”等。无论是参与研究，还是自己主持，我都注意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

坚持自己的理论立场。为此，不仅抵制和对抗过一些人的干预和插手，而且直接顶撞过我的顶头上司，甚至于多次公开辩论，因而以“不听话”著称。其实，在现行体制下，虽不能说是所有领导，但绝大多数都不喜欢这种有独立思想的人。为此，我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最令人惋惜的是，当时我想出国把英语关过了，以便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但领导不给我这个机会。不过，教训也有，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长江考察时，一位同人执笔找我合作写了一篇观点有悖我意的文章，尽管我曾写信说明，但碍于情面，态度不够坚决，他拿去以我们二人的名义发表。此事令我追悔莫及，常常提醒自己。因而，在以后的学术生涯中，基本上都是自己动手，不愿依靠他人和自己的学生做事。难怪我的学生的同学对他说，“你们的老板（这里是指导师）真好，从不要你们做事，不像我的老板，我们不得不经常为他打工”。加之，看到一些同人文章依靠学生出现的低级错误，更坚定了自己的做法。在这套文选中收入的文字，有少数是合作研究成果，也主要是我亲自执笔，由他人执笔的几篇，也是由我提出课题和思想，并最后修改定稿。

1993年，我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聘为博士生导师，先后带的硕士和博士生有十多名。原规定可以招到65岁，带到68岁，但60岁时单位就一刀切要我退休，此后就没有在社科院再招收博士研究生。不过，编外弟子不少，很多不是我的学生，但在论文的指导以及做人处世方面，我的作用和影响也许不下于他的导师。毕业和工作以后，他们都与我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这里，我想简述一下我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做的事情。这也是我学术活动和人生经历的一部分。1993年7月26日，我和茅于軾、盛洪、樊纲、唐寿宁等五位学者一起，与大象文化公司合作创办了天则所。这是一家创办较早且名实相符的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其宗旨就是要坚持和实践自由思想和自由讨论的学术理念，推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实践。天则所创立以来，其活动有成功，也有失败，工作有波动，也有起伏，内部有矛盾，也有争论，但终究坚持了十多年，并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其他方面的事情暂且不论，仅就我所负责的学术工作（我一直任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1999~2002年任所长期间，名义上不是实际上仍然代管学术工作）来说，诸如，较早地组织举办了天则双周学术论坛，至今已经坚持了350多期，为社会科学各个学



科搭建了一个自由交流的平台；现在各种各样的论坛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每个季度提供一个分析报告，举办一次“宏观中国”论坛；现在宏观分析已经是群雄蜂起，诸家竞争。率先把案例研究引入国内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组织和主持了《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现已出版了五个案例集。另外还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经济学》系列14集和组织了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未来天则所如何发展，会达到一种什么地步，既取决于外部环境，也取决于天则理念的坚持和战略的选择，同时也与内部治理有关，这里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现在还很难预断。就我自己走过的道路来看，创办天则所既有很大的付出，也有不小的收获。

在我出道以后，曾经有好几个中央部委的研究单位请我去当官，拟任命我做研究院院长、研究所所长之类，并承诺解决诸如住房之类的实际问题。由于长期住在三里河名为两室实则一室一厅的住房内，架床叠桌，女儿从学校回家只能打地铺，唯一的希望是能有一张四条腿的床，夫人希望能够有一个朝阳的房子，朋友也劝我能够满足一下夫人的愿望。这些都是正当的要求和愿望，人情入理，毫不过分。但考虑到自己生性耿直，崇尚“独立意志，自由精神”，不愿趋炎附势，曲意逢迎，既不愿当官，也当不了官，同时深知到各个部门以后，就得围绕着领导转，用自己的笔去表达别人的思想，写文件，写讲话稿，没有了能够独立自主做学问的条件和环境，因而执意不去。甚至对夫人说，“你要是想让我少活几年，咱们就去当官”。因此，夫人批评我自私自利，我也无言以对，在这件事情上也许如此，我也是常人，并不那么高尚。到现在，在房子问题上，夫人的心愿仍未实现。这也是我非常歉疚的事情。

我之所以不去当官，也不去经商做企业，还有深一层的原因，虽然这些职业是社会必要的，也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但必须采取官方的立场和为营利而奋斗。而我则有着一个独立学人的情结，喜欢做一个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只是想自由思想，自由言说，对任何事物保持一个批判的态度。至于我的观点和看法是否符合正统意识形态，能否被官方和业界接受和采纳，这是他们的自由和权利。

我的专业方向是宏观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但实际所做的研究内容则比较广泛。根据研究工作涉及的内容和方面，我将《张曙光文选》设计为五卷，分别是：

《人道求索未驻足——学术论文卷》，

《心交神往知与识——序文前言卷》，

《评书论人和不同——学术书评卷》，

《短章随笔辨是非——经济评论卷》，

《真实有用稻粱谋——研究报告卷》。

人常说，文如其人。从这些文章中，不仅可以了解我的学术观点和学术态度，而且可以了解我的脾气禀性，为人处世。总之，可以对本人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当然，是非功过，任由大家评说，这套文选就是一个靶子。

二

1996年，本人出版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出了增订版，定名为《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四川人民出版社）。借此，笔者博得了一个“批评家”的雅号，请我做序和写书评的人也多了起来。21世纪以来，这样的文字有六七十篇之多，加上上个世纪的作品，不下于百篇，一百多万字。这次，我从其中选出一半多一点，编成两个集子，一个是《学术书评集》，一个是《序文前言集》。

由于请我写序和做书评的人日益增加，本人总结了自己以前写作书评的实践，为自己确定了几条行为守则。第一，不论何人，凡请我写序和做评者必须先将所评著作和文稿给我，在没有读完书稿以前，我不会做出任何承诺。第二，不论评与不评，也不论好评坏评，必须在读完书稿以后再定。第三，凡请我写序和做评者，评论稿在公开发表前必先送被评者审阅，所提修改意见均由本人裁定，并明确表示，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不能随意删改。第四，不论是名人大家，还是无名晚辈，不论是高官鲜贵，还是平头百姓，对所有人一视同仁，愿评则评，不愿评则作罢，该好评则肯定，该批评则批评。读者从《学术书评卷》和《前言序文卷》中可以对以上几点进行检验。据此，我既婉言谢绝了一些名人的约请，也主动评论过一些晚辈的大作。对一些名人、高官和老板的作品曾经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也对一些硕士博士的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对于一些不错的作品，在给予肯定评价的同时，总要指出它的缺陷和不



足。因为笔者有一个信念，深感只有如此，才能对得住他人的信任和自己的良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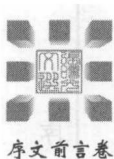
收入的评论文章都是一种学术性书评，这类书评的写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仅有水平问题，更重要的是态度问题。水平问题是需要通过学习和积累而不断提高的，只要虚心用功、熟读精思，不是简单地用自己的意见去猜测和评判，而是用心发现作者的独具匠心或者失足之处，就必然会有所成。正如钱穆在撰写《朱子与校勘学》中所说，“校勘之学，固贵于客观之与材，而尤贵乎主观之鉴别。鉴别之深浅高下，则不凭乎外在之材料，而凭校者之心智。而心智之深浅高下，则视乎学养所在，而其事固为学者所不易自知者。是则校勘之学，若有凭，而实无凭”。态度问题其所以重要，就在于目前的学风太浮躁，认真看书学习者不多，严肃推敲评论者更少，除了笔者严厉批评过的“广告式”和“推销式”书评以外，一些书评海阔天空、云山雾罩地神侃一通，多半也是没有认真读书的结果。更有甚者，一些书评的写作往往是作者自己捉刀代笔，而评论者只要签名而已，这种廉价的交易，败坏了一代学风。甚至很多教授参加博士学位论文答辩，竟然不看论文，或者只看内容提要，居然敢坐在答辩席上，不知如何为人师表。然而，书评不仅关系到作者的辛勤劳作和对读者的影响，而且关系到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因此，一种敬畏的心理和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不要从事书评的写作。笔者自信是严肃认真的。

我的确把写序和做评作为逼使自己读书的一种办法，因而对于斯蒂格勒的名言“我的知识和贡献是从书评中得到的”，深有同感。在中国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经济学研究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笔者已近古稀之年，受的是传统经济学的教育和训练，外语基础也不好，其所以没有掉队，还能勉强地跟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前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读书和书评。我对博士论文比较关注，凡请我参加答辩的论文，不论好坏，我都从头至尾认真看一遍，然后再写出评语或者决定是否参加答辩，其原因在于，一是现在只有为了写作博士学位论文，很多人才认真看书学习，因而从博士论文特别是一些好的论文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二是也正因为第一个原因，每篇论文都必须对自己所论领域的文献进行综述，也就会涉及本领域的前沿问题，从一些好的综述中也能够了解这个领域的理论发展。这样一来，有些理论笔者并未专门研究，但对

其前沿问题并不陌生，道理也在这里。对于所评著作不仅要通读一遍，而且要反复翻阅。为了给《制度演化分析导论》写序，笔者从头至尾认真读完了这本有750页的大部头才动笔，写作过程中还不知翻过多少次。在一次书评之后，笔者曾经对一位作者说，“我不是夸口，对于你们著作的熟悉程度，我不在你们三人之下，只要你提出书中的某一个观点，我很快就能找到它的出处。你们的书我不知翻过多少遍，封面上的书名和作者名，已经给磨掉了”。

学术批评是一件对事（书）不对人的事情，中心是阐明书中的真理成分，肯定作品对人类知识生产和学术进步的贡献，揭示作品的不足和失败之处，探寻改进和发展的方向和途径。这里讨论的问题包括，书中所论问题是否得当，提出的假设是否合理，框架设计是否清晰，逻辑推理是否严谨，所用资料是否翔实，分析方法是否适当，论证是否充分，有无发展和创新之处等，所以，从根本上来说，书评与人际关系无碍。但是，在目前的社会环境和学术生态中，这样说易，这样做就难。因为我们都生活在社会中，都有这样和那样的关系，特别是大家都是学界同人，能够批评和敢于批评以及敢于面对批评的，水平尚在其次，是需要一点勇气和雅量的。对此，笔者在《书评集》初版和修订版自序中曾经有过论述，针对一些新的情况，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在学术性书评中，批评者不见得是对的，只是从自己角度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其所以愿意和能够提出不同意见，首先是出于对作者的尊重，把作者当做一个能够和值得与之平等对话和理性交往的对象。其次是作者讨论的是个重要问题，它引起了评论者的兴趣和思考，因而有共同的论题可以讨论，有不同的思想需要交流。再次是这样的讨论和交流绝不是要分个青红皂白，谁是谁非，仅仅是相互切磋和思想交流而已，有些问题甚至还要一直讨论下去，因此，批评和反批评都很正常，各自都有坚持自己观点的自由。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只有通过这样的讨论，才能激发进一步的思考，把研究引向深入，从而达到促进知识生产、增加知识积累和繁荣学术创作的目的。因此，不论是作者，还是评者，千万不可纠缠于人际关系之中，把学术批评的圣洁事业庸俗化，也不可把学术批评与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混在一起，用政治批判和道德评判来简约、代替和抵制学术批评，这会把学术批评引入歧途。笔者的这些议论绝非无病呻吟，而是亲身经历，深有所感。



学术书评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之类的问题，因而常常会涉及学风问题，因为，学术上的成就与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好的作品都是严谨认真学风之所为，不好的作品也往往反映了作者学风上的缺陷和不足。对于学风问题，说好皆大欢喜，批评更需慎重。因为，学风上的缺失是作者某些有悖于学者行为的错误，当然涉及作者的学品和人品，如果说学术观点的争论可以各执己见，即使错误观点也是认识问题，批评尚且可以接受，那么，学风上的缺失就不仅仅是认识问题，对于不当学风的批评就不那么容易提出和接受，因而也最易于引起人际关系的紧张，造成学者反目，使正常的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笔者曾经多次遇到过此类问题。回顾这类事情的经过，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也许是必要和重要的。

首先，对于此类问题只能就事论事。与学术观点不同，这类问题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判断问题，用不着争论。评者只要指出错误事实予以批评，不可进一步引申和推断，作者也不必掩饰和辩驳，双方都不能随意猜测和怀疑，特别是不能猜测和怀疑对方的动机和能力，更不能以威胁相对待。还是那句老话：“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否则，只能是越抹越黑。

其次，要把学风问题与学术观点、政治观点加以区别。既不能因学风不正而否定其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也不能因学术观点和政治观点的正确而掩盖学风问题，更不能强词夺理为错误辩护。数年前笔者曾经指出过一本畅销书中的多处数据和引文错误，批评作者学风不正，而作者则强词夺理，把大量的数据和引文错误推给原作者，并用政治观点为其辩护。不仅如此，也有学者认为，该书政治方向正确，批评它的学风错误会淡化该书揭示的问题，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其实，真正淡化和削弱该书社会影响不是笔者的批评，而是这些不严谨的学风造成的错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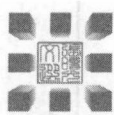
再次，要把学风问题和私人关系分开。私人关系好，学风错误要不要批评，能不能批评？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因此关系破裂，朋友反目，也应当坚持。这是关系到净化学术场域和规范学者行为的大问题。同时，也只有经得起这种考验的友谊才是正当的和可贵的。我相信，犯错误者迟早是会自责的，即使没有勇气公开承认，甚至还要遮掩和粉饰，内心也是不会平静的。在收入的书评中，就有对老朋友的严肃批评。

最后，纯洁学风需要学术界共同努力。在目前的学术生态和制度环

境下，我们的学风已经败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成为阻碍中国学术发展的一大问题，一些学人违背为学做人的底线，做出了一些简直令人无法容忍的事情。抄袭之风甚烈，浮躁之风更甚。很多博士生导师忙于社会活动，整天出没于论坛会场，在电视、报纸等媒体上频频曝光，或者身兼数职，既当教授，又当官员或者又做生意，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赚钱、玩乐、拉关系上，没有时间读书思考，于是学生写文章，老师跟着署名，而且还要当第一作者。有的甚至连文章看也不看，就把大名签在上面。结果是错误满篇，笑话百出，学生抄袭剽窃，老师拿来当做自己的创造。仅以《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和2008年第7期处理的两起事件就可见一斑，前者是一个恶劣的抄袭事件，后者是学风严重败坏。本卷中“中国经济学研究：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学》（2006）前言”和《学术书评卷》中“学风太坏，纠错真难——从《经济研究》的《通先》读起”，就涉及和专门讨论了后一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对于那些极坏的学品和学风，我们的学界和社会充满了犬儒主义，不是采取批判、谴责和声讨的态度，而是采取容忍、放纵、同情，甚至包庇和支持的做法。对于公开揭露出来的一些抄袭剽窃和学风败坏事件，学人不能坚守自己的责任，予以谴责和抵制，单位不做严肃处理，或者大事化小，轻描淡写，事主也不公开认错和道歉。基于关系学的潜规则，对于揭露和批评此类事件的文章和稿件，有的刊物不予刊发，有的有意将此类内容删掉，扮演了一个保护错误、助纣为虐的角色。而对于揭露此类事件和维护学术纯洁的人士，有人甚至把他们当做“刁民”、“刺头”，甚至对其排挤和打击，于是，正气不张，邪气猖獗。这也是此类歪风邪气不断重复出现和滋生蔓延的根源之一。要知道，这种做法将会对中国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极大的损害，这个历史责任终究是逃脱不了的。

守住为学做人的底线，旗帜显明地同这类现象做斗争，以维护学术研究的纯洁性，是学界同人、教学研究单位和刊物出版机构的共同责任和义务。对于现行学术管理体制上的弊端，需要加大揭露和批判的力度，在行动上能够抵制的抵制，抵制不了的，至少要做到洁身自好，绝不能同流合污，推波助澜。那些处于学术领导地位的有良知的学者，应当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营造出一种有利于知识生产和学术成长的小环境和好氛围，在自己的单位内突破现行体制的约束，进行学术制度和学术规



范的建设和创新。对于抄袭剽窃之类的学品问题，决不当放过，这种人是学界的骗子和扒手，从根本上丧失了做一个学者的资格，学界同人应当共同讨伐，形成一种老鼠过街之势。否则，姑息养奸，此患绵绵。对于学界的浮躁之风也应当严肃对待，坚决抵制。在这里，要坚决反对两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做法，一是只要所谓学术观点正确，技术性错误和常识性错误可以原谅；二是只要所谓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正确，学风不正和资料错误不必追究。因此，改造我们的学风，仍然是中国学界面临的重要任务。否则，学术上的创新就只能是口头上的高调和大话。

《前言序文卷》共收入了 40 篇评论文章。其中 11 篇是原《书评集》、《讲演集》和《随笔集》中收入的，其余 29 篇中，有 25 篇是 21 世纪以来撰写的。分为三个部分编排，自序 7 篇，主编前言 13 篇，论著序文 20 篇。

本文集的出版要感谢我的老师和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多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感谢我的夫人、女儿和女婿，没有他们的理解和支持，我的研究工作会遇到很多难以克服的困难；还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丁利、金祥荣和有关杂志社和出版社，他们允许我将这些文稿收入，感谢张良先生，他帮我扫描了 1993 年以前的不少文稿；感谢中国经济 50 人论坛、段绍译先生和罗必良先生的资助；最后要感谢中国经济出版社和责任编辑。

2007-06-15，初稿

2008-06-12，修改，于北京方庄芳城园

目录 <<<

自序	1
----------	---

一、作者告白

作者其人

——《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自序	3
-----------------------	---

读书和书评

——《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自序	7
-----------------------	---

抱负与雅量

——《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自序	12
------------------------	----

积累和探索

——《制度·主体·行为》后记	17
----------------------	----

读书乐，思考亦乐

——寄语《中华读书报》“经济书廊”创刊（代序）	19
-------------------------------	----

理念和追求

——《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自序	21
-----------------------	----

耕耘和收获

——《中国转型中的制度结构与变迁》自序	24
---------------------------	----

二、主编前言

制度变迁与案例研究

——《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前言	31
------------------------	----



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2集）》前言 48

演进社会中的制度设计与实施

——《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3辑）》前言 61

直面现实 深度挖掘

——《中国制度变迁案例研究（第4集）》前言 86

民营经济发展与中国制度变迁

——兼论知识生产与案例研究 98

内外开放与制度变迁

——《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广东卷）前言 122

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

——《中国经济学——1994》前言 145

立足本土 走向世界

——《中国经济学——1998》前言 164

中国经济学研究：当年评介和30年反思

——《中国经济学》（2006）前言 195

市场化与宏观稳定

——《市场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前言 238

系统观察 认真分析 创造特色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1集）前言 246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4集）》前言 249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报告（第5集）》前言 253

《天则双周学术讲演系列》前言 257